

## 福琼第一次来华博物学考察的三重背景研究

### Research on the Three Backgrounds of Fortune's First Natural History Expedition to China

闫晗 /YAN Han 贺天平 /HE Tianping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 山西太原, 030006)  
(Institute for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Shanxi, 030006)

**摘要:** 鸦片战争后, 英人来华博物学实作受两国关系影响有了新的特征。由伦敦园艺学会派遣, 罗伯特·福琼是战后第一批来华的植物猎人, 在香港岛、舟山、鼓浪屿等英军管辖地及其周边展开了野心勃勃的博物学考察, 向英国引入了大约40种新的植物。这次活动是福琼之后频繁来华考察的重要契机, 通过研究, 福琼第一次来华博物学考察系个人、社会、国家根源相互交错的结果, 这一背景对于剖析近代英人来华博物学实作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罗伯特·福琼 中国 博物学

**Abstract:** After the First Opium War, British natural history practice in China acquired new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Sent by the London Horticultural Society, Robert Fortune was among the first group of plant hunters to come to China after the war. He carried out ambitious natural history surveys in and around the British-controlled areas such as Hong Kong Island, Zhoushan, and Gulangyu Island, and introduced about 40 new plants to Britain. This activity wa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Fortune to make frequent subsequent visits to China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s. Through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the first natural history survey of Fortune in China wa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weaving of personal, social, and national factors. These backgrounds are enlightening for analyzing the practice of natural history by the British in modern China.

**Key Words:** Robert Fortune; China; Natural history

中图分类号: N09; Q94 DOI: 10.15994/j.1000-0763.2026.06.009 CSTR: 32281.14.jdn.2026.06.009

范发迪在《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 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一书中写道“如果我们认真探索19世纪在华的欧洲科学活动, 我们就应该看重博物学, 因为从人员参与、活动层面、科学界的重视各方面而言, 博物学都是那个时期欧洲人在华最广泛的科学活动。其理由一方面是因为博物学在当时欧洲社会里蓬勃发展, 蔚为风气; 另一方面是因为博物学与欧洲

海洋贸易、帝国主义扩张之间具有多角互动关系。”([1], p.4)或许正是在这种庞大而复杂的关系网络的吸引下, 从宏观/微观、全球/地方、组织/个人等不同角度展开的在华英国博物学家的研究卷帙浩繁, 呈现出清晰的英人在华博物学实作图景。

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 英国植物猎人, 曾于1842-1862年受到不同组织的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软计算’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项目编号: 17ZDA029)。

**收稿日期:** 2025年8月12日

**作者简介:** 闫晗(1992-)女, 山西宁武人,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科学史。Email: 805595805@qq.com

贺天平(1976-)男, 山西蒲县人,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教授, 研究方向为自然科学史、科技与社会、科学与哲学。Email: htsp@sxu.cn

派遣五次来华,前后共引入了上百种中国植物,尤其是对中国茶叶的考察与引种改变了全球茶叶格局和贸易版图——当一个单一物种被移植到它的故土之外的时候,这个世界也随之发生了永恒的变化。([2], p.309) 本文聚焦于福琼受伦敦园艺学会(London Horticultural Society)派遣的第一次来华。这次来华的首要目标是收集观赏性或实用性的种子和植物,最终引入大约40种新的植物(不包括仅有少许颜色不同的变种)。那么,福琼来华是出于强烈的博物学兴趣还是谋生的利益?是个人的意愿占有上风抑或是仅仅带着政治目的的一项任务?为回答这一问题,笔者拟从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面探究这次活动的三重背景及其联系,并以此为基础,勾勒鸦片战争后英人来华博物学实作的新背景与新特征。

## 一、福琼的早期博物学实践

福琼博物学志趣的形成深受生活环境的影响。一方面,他的家乡——英国埃德罗姆(Edrom)受温带海洋性气候影响,自然风景优美,是各种植物生长与动物栖息之处,布莱克德河流经此处,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优越的地理环境。另一方面,他的父亲托马斯·劳夫·福琼(Thomas Lawful Fortune)长期为凯莱庄园的地主维护树篱,于是,“福琼从父亲那里学会了如何分辨不同的乔木和灌木,并利用由弹性的树枝来编织坚不可摧的栅栏……”([3], p.8) 结束学业后,福琼首先成为了父亲的学徒,学习园艺方面的知识,积累一般的基础性植物学种植及料理方法。

结合福琼的传记及当时苏格兰低地区域的教育情况可知,福琼在困窘的家庭条件下也获得了受教育的权利。根据苏格兰学者托马斯·马丁·迪瓦恩(Thomas Martin Devine)的研究,当时这一区域的底层群众可以学习英语阅读、写作、算术和地理,甚至还有法语、拉丁语和希腊语。([4], pp.71-96) 教育成为福琼入职伦敦园艺学会的入场券之一,因为伦敦园艺学会不仅对学徒有严格的标准,派遣福琼前往中

国时也提出了要求——“关于这些研究对象,你必须整理出一个非常详细的日志,记录下你每天的观察过程,或对于那些可能遇到的研究对象所提出的建议。这些整理成资料,其中你对中国旅行探险的叙述随后将提供给协会研究使用。”<sup>[5]</sup>

在前往中国之前,福琼先后在莫顿庄园、爱丁堡皇家植物园(Royal Botanic Garden Edinburgh)和伦敦园艺协会奇斯威克花园(也被译为“奇西克花园”)从事园艺相关的工作,有一定的植物学经验。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始建于1670年,是英国第二古老的植物园,园长威廉·麦克纳布(William McNab)任职期间,引进异域植物的同时也非常重视本土植物群的研究,因此对苏格兰植物群有深入的了解,“每年的8月和9月,福琼和麦克纳布会带领一些学生到不列颠群岛的各个岛屿寻找植物。这些实地考察也使他们得以扩大爱丁堡皇家植物园所收集植物品种的数量。这种锻炼也增加了福琼对苏格兰高地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在中国北方省份3年游历的过程也曾提到了苏格兰高地。”([3], p.12) 可想而知,福琼在本地实地考察的过程中提高了辨识植物的能力,也表现出了令麦克纳布承认的优秀品质,因此,后者将其推荐至伦敦园艺学会任温室管理员一职。1840年福琼前往伦敦奇斯威克花园,在经验中进一步提升了博物学的理论与实践能力。作为伦敦园艺学会所建立的实验花园,这里接受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由植物收藏家所带回来的标本,此时,英国领土扩张到极致,覆盖了世界陆地的近四分之一,很多稀有植物品种在政治权力的庇护下远涉重洋,在英国被栽培和研究,而福琼也在工作场所接触到更多的异域植物,但这一时期,中国植物的移植并不多。

但是,如果在这一叙事框架下,显然忽视了福琼的主体性,他也有强烈的表达自我兴趣、实现内在价值、提升社会阶级的心理需求。形成于中世纪的英国贵族体制导致社会阶级结构的固化,政治权利与经济资源的垄断使得科学文化也深受其害。伦敦园艺学会建立初期便设有严格的会员制度——要成为会员,必须在理

事会会议上被提名并被接受，然后缴纳3几尼的入会费和2几尼的年费，相当于今天的入会费为2500英镑，年费为1600英镑。因此，会员通常来自较富裕的社会阶层。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为其服务的植物采集者，像福琼一样的个人或科学机构派遣的植物采集者大多数都是匆匆过客，他们是被挑选出来的专门采集标本的园艺师，尽管他们受雇于园艺学会等大名鼎鼎的机构，并不代表他们由此跻身绅士之列。英国学者安布拉·爱德华兹（Ambra Edwards）提出植物猎人的采集活动有不同的目的：一些是为了推动科学事业，另一些是出于商业动机，寻找可能对帝国有经济价值的植物，或是发现适合园艺的植物，以供应蓬勃发展的苗圃贸易。（[6]，pp.13-14）但这两点仍然属于伦敦园艺学会的立场，而弱化了福琼等植物采集者的行为动机。福琼前往中国的底层原因是需要一份赚钱谋生的工作，如果能获取稀有品种便意味着更高的收入、更富裕的生活，甚至是更高的社会声望……福琼的家庭需要这样一份工作，除了一年100英镑的薪水之外，游记的出版以及从中国带回的瓷器、玉器、漆器、雕刻等物品的拍卖也改善了贫困的生活。更深入地看，从苏格兰边境走向遥远的太平洋沿岸地区，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后，福琼冒险前往中国，他对于罕见植物的兴趣与追求远远超出了物质范畴，心理动机才是激发起行动力的根本因素，而这种心理动机的形成与英国博物学的新发展不无关系。

## 二、英国博物学传统与转向

英国的博物学传统由来已久。自中世纪英人便有观察自然界的习惯，但这一时期的系统观察和艺术再现自然模式并不多见，宗教统治下的教会和《圣经》毕竟才是人们获得自然界知识的正统来源。（[7]，pp.44-45）16世纪开始，观察基础上的文字性描述增多，威廉·特纳（William Turner）的《新草本志》（*A New Herbal*）、约翰·杰拉德（John Gerard）的《草本志》（*The Herbal*）是这一时期英国植物学研

究风格的代表作，尽管殖民扩张活动已经开始，但这一时期的博物学探索活动及出版物仍以英国本土为主。17世纪英国田野博物学家和博物学著作的数量逐渐增加，博物学进入新时期——“这是一个所有学科每天都有新发现的年代，尤其是在植物研究上：从平民百姓到王子和权贵，所有人都急于寻找新的花卉来补充他们的花园和庭院；植物采集者被派往遥远的印度，他们翻山越岭、跋山涉水，探寻地球上每一个角落，并为我们带回一切隐藏的物种。”（[8]，p.16）可见，这一时期英国博物学加快向外探索的步伐，与殖民侵略几乎同步，同时植物采集者的角色较为鲜明地被记录在册。

至18世纪，英国博物学在生物分类系统确立的基础上迎来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帝国博物学特征逐渐显化。一方面，博物学成为独立的科学门类，主要由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三类学科组成，脱离道德教化，取而代之的是严肃、客观的观察记录和理性解读。<sup>[9]</sup>另一方面，瑞典学者卡尔·林奈（Carl von Linné）所开发的活生物体分类系统为帝国博物学提供了学理基础，一个统一的博物学范式无疑有助于为帝国的全球探索和扩张服务，也是当时欧洲学界的客观要求。<sup>[10]</sup>有赖于此，英国探险家班克斯（Joseph Banks）在几次探险活动后，以推动国家商业发展和帝国扩张为理由，说服英国政府投资科学研究事业，从而把知识与权力、科学组织与国家机构、植物爱好与商业利益紧密地联系起来。（[11]，p.213）在他的管理下，邱园（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全国性植物学网络。这时人们意识到，具有经济价值的植物不仅可以丰富博物学的宝库，还可以通过贸易直接带来财富和权力，不同的机构利用王室、政府、东印度公司的资助，雇佣、组织、派遣植物猎人在全球内观察、描述、分类、命名、采集、移植新的物种，博物学与大英帝国扩张的互助共生关系使得它有着殖民侵略和经济掠夺双重意义上的帝国性。但是，对罕见植物的竞争和兴趣绝不局限于上层阶级和中层阶级，中低层和工匠层也充当了生产园艺知识的角色，甚至有专门的“种花人”培育

新奇的植物品种。([12], pp.129-132)

为满足博物学,尤其是植物学向外探索的需求,英国本土建立了多个可容纳不同国家植物的专业组织及场所,伦敦园艺学会便是其中之一。1804年班克斯、理查德·索尔兹伯里(Richard Anthony Salisbury)等人建立了伦敦园艺学会,并决定该组织“收集关于植物和树木的栽培和处理的所有信息,包括烹饪和观赏植物”“培育和鼓励园艺的每一个分支,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艺术”“在学会的目标范围之内,应考虑对园艺的成就给予奖励,只要认为这是应当做的”。([13], p.9) 1815年之后,学会的注意力开始转向从欧洲以外的国家获取有价值的植物,学会会员、前东印度公司驻华茶叶检查员约翰·里弗斯(John Reeves)最早将中国植物(种子)带回伦敦园艺学会,包括山茶花、中国水仙、玫瑰、菊花等,其中一株活的紫藤于1818年栽种。为了鼓励这种行为,英国政府热忱地提供帮助,例如:收到中国货物,所有的植物、种子等应及时运抵,凡是从国外寄给学会的货物,都允许免税通过海关。([13], p.15) 1858年,阿尔伯特亲王出任英国伦敦园艺学会会长,1861年学会获得皇家特许状,更名为皇家园艺学会,英国王室成为皇家园艺学会的长期赞助人,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再次得以巩固。

英国博物学的新发展强调了自然知识的场所和形式尽管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存在差异,但同时也表达了相互交往的氛围。一方面,博物学研究向外开拓的过程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英人对于自身区域与外部世界的理解,对世界整体图景的把握。作为由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及北爱尔兰所组成的联合王国,英人对于博物学的研究早期集中于国内,随着帝国主义境外扩张,博物学向外探索的脚步加快,构筑了以殖民地为主的全球性网络。另一方面,在全球性博物网络塑造的过程中,个人、团体、政府成为这张网的节点,伦敦园艺学会等机构更是个人与政府联结的中间者。早期的科学研究主要是有钱人的个人探索爱好,博物学也是如此,17世纪受个人、组织雇佣,植物采集者

前往遥远的国度探索一切隐藏的物种,18世纪英国政府也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这项炙手可热的事业。福琼的第一次来华博物学考察活动正是在伦敦园艺学会与英国政府的共同支持下展开的。

### 三、鸦片战争后的英人来华博物学考察

1840年,以清朝钦差大臣林则徐奉旨至广州严禁鸦片,与大英产生贸易、司法和外交冲突为导火索,英国政府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打响,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鸦片战争战败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性质,英人来华博物学考察呈现新面貌。从时间上看,福琼是鸦片战争后伦敦园艺学会派往中国的第一批植物猎人,他的考察活动与鸦片战争及《南京条约》的签订有很深的渊源,为阐释《南京条约》对英人来华博物学实作提供了典型案例。

#### 1. 伦敦园艺学会中国委员会的角色

福琼第一次来华由伦敦园艺学会中国委员会(下文简称“中国委员会”)直接下达指令,他本人也是成员之一。该组织成立于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之后,由约翰·里夫斯(John Reeves)所倡议,目的是在中国部分放宽对外国游客的限制后,派遣一名植物采集者到中国。有关中国委员会如何建立不得而知,至少目前看到的档案中并未明确提及,但是笔者在皇家园艺学会档案(RHS Digital Collections)中找到了三场会议记录,<sup>[14]</sup>它们清晰记录了中国委员会派遣福琼前往中国的具体过程,为考察其来华背景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1842年12月28日,会议由园艺学会副会长乔治·洛德迪格斯(George Loddiges)主持,出席者包括:里夫斯、秘书亚历山大·亨格森(Alexander Henderson)及继任者詹姆斯·高文(James Robert Gowen)、助理秘书约翰·林德利(John Lindley)。会议宣读英国外交部副国务大臣查尔斯·坎宁(Charles Canning)建议推迟前往中国的来信;普拉德霍(Algernon Percy)勋爵建议园艺学会开具正式的介绍信以便于获得外交部门的保护;讨论来华细节和

给船长的报销；承诺由香港的颠地银行（Dent & Co）提取资金；提供给福琼的仪器和工具清单——几个温度计、一把铲子、一个钩镰、一个地质锤、一个救生圈等；要带回的植物清单——佛手、金桔、福建白百合、感应草、牡丹等；建议从乍浦（浙江省乍浦县）周围获取日本植物；请求阿伯丁（George Hamilton Gordon）勋爵授予福琼一块香港的土地。

1843年1月12日，出席者新增园艺学会副会长爱德华·巴纳德（Edward Barnard）和财务主管托马斯·埃德加（Thomas Edgar）。会议之前，福琼向林德利提出——“不要忘记，中国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处于同英国人的战争之中，许多居民视英国为敌……一根棍子恐怕不能吓到任何一个武装的中国人。我对枪支的使用会非常谨慎，这一点您尽可放心。”（[3], p.21）会议最终决定提供一支鸟枪和几支手枪，“鹞鹑号”（Emu）船票、中文词典以及可在澳门居住的一个房间。

1843年2月23日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会议提交了帕尔玛公司开具的500英镑汇票，作为福琼的活动经费；中国委员会收到了来自斯坦利（Edward George Geoffrey Smith Stanley）勋爵和阿伯丁勋爵等人写给英国驻中国军队将领的介绍信，目的是请他们保护福琼在中国的安全。这次会议特别建议福琼“在中国政府实施新的限制措施之前，应首先访问鼓浪屿（Goolongsoo）和舟山（Chusan）”。<sup>[14]</sup>会后，中国委员会拟定了长达9页的最终指令<sup>[5]</sup>——

你的一般目标是：（1）收集在英国尚未种植的观赏植物或实用性植物的种子和植株；（2）获取关于中国园艺和农业的信息，以及气候的性质及其对植被的显著影响。其中列出的植物清单如下表1。

中国委员会与政府官员的往来通信证明福琼来华确是园艺学会派遣，也说明这次计划有其特殊的政治背景。鸦片战争为沿海地区人民造成深重的苦难，中英关系交恶，来华在当时危险重重，遑论深入内地，因此英国政府推迟行动的建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然而，中国委员会无论出于求知还是利益驱使，并没有就此作罢，因为《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军在华控制地以及中国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为园艺学会的东方博物学探索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那么，《南京条约》如何改变了英人在华博物学实作呢？

## 2.《南京条约》对英人来华考察空间的影响

福琼并非伦敦园艺学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位植物猎人，鸦片战争前，约翰·伯茨（John Potts）和约翰·帕克斯（John Damper Parks）曾先后来华，当时他们搜集到的植物种类大多数属于广州和澳门两处。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英人来华博物学考察不同以往，“大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宁波厦门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清政府将永久割让香港岛予大英治理”“大英水陆军士当即退出江宁京口等处江面并不再拦阻中国各省商贾贸易至镇海之招宝山亦将退让惟

表1 福琼首次来华需采集的植物名单

北京的桃子	各种品质的茶树
吊钟花属	重瓣黄玫瑰（the double yellow roses）
能制作宣纸的植物	莲属植物
蓝色花朵的芍药	佛手
猪笼草	黄色花朵的山茶花
叫作 song-pee-leen 的中国橘子	金桔
福建百合	感应草
石松属鹿角草	广东杜鹃花
阿特拉斯蛾茧	有商业价值的藤条
青葙属与菟属植物	芍药和牡丹
八角属植物	竹子的种类及其用途

有定海县之舟山海岛厦门厅之鼓浪屿小岛仍归英兵暂为驻守迨及所议洋银全数交清而前议各海口均已开关俾英人通商后即将驻守二处军士退出不复占据”<sup>[15]</sup> 几项条款对英人来华博物学实作产生了极大影响。

一方面,《南京条约》拓宽了中国博物学考察的范围和类型。1757年,清政府下令“此地非洋船聚集之所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sup>[16]</sup> 取消原有的江、浙、闽、粤四海关外贸进口的规定,改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广州自此成为全国一口通商之地,也是从此时起一直到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唯一的法定对外通商口岸。由于活动范围有限,外国博物学研究者的“远征”很少超过广州城外一代的花园、苗圃、鱼市、药铺和古玩店,田野工作场地也只是位于洋行区上游约三英里的花棣,此外还有十三洋行管理者行商的华丽庭院中。([1], pp.27-45) 简而言之,博物学家或采集员深入内陆是绝对不可能的。《南京条约》最为直观的变化便是扩大了英人的活动范围,香港岛、五个通商口岸以及英军暂时控制的舟山与鼓浪屿为西人深入中国内陆进行博物学考察打开了大门。笔者根据福琼的游记《华北诸省漫记》(*Three Years Wanderings in the Northern Provinces of China*) 简要整理了福琼第一次来华的路线图(见图1),尽管并没有造访所有的

通商口岸,但他还是考察了香港、厦门、舟山、宁波、上海、苏州、广州、福州多个城市。事实上,这些地区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中国的北方地区,可是对比前人的考察范围,福琼所到之处确实已经大幅度向北延伸。

在政治剧变的促发下,英人考察的焦点逐渐从已被搜寻殆尽的花园与苗圃转移到野生植物上,从观赏性或实用性的园艺及装饰植物转移到经济植物为主的研究领域。然而,福琼毕竟是条约签订后最早来华的人,因此,这一变化在他的身上体现的还不够明显。梳理其第一次访华成果,首次在中国以外种植的种类约40种,例如舟山群岛的木通(*Akebia quinata*)、上海的柔毛大碗花(*Calystegia pubescens*)、广州的兰香草(*Caryopteris incana*)、浙江的小苜蓿(*Medicago minima*)、香港的光叶海桐(*Pittosporum glabratum*)……还有一些颜色不同的变种,就广州的牡丹,福琼一共发现了19个品种。([3], pp.47-53) 不能否认,这些成果确实能带来一定的商业价值,但远远不能与他之后所从事的博物学考察相提并论。

另一方面,《南京条约》加速了帝国主义对中国地方性知识和文化的侵略。在认知层面上,博物学家以“科学”“统一”的分类和命名体系取代地方性知识和多样性的传统文化,实现了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知识和文化侵略<sup>①</sup>。分类与命名是林奈工作的两大课题,在英国,林奈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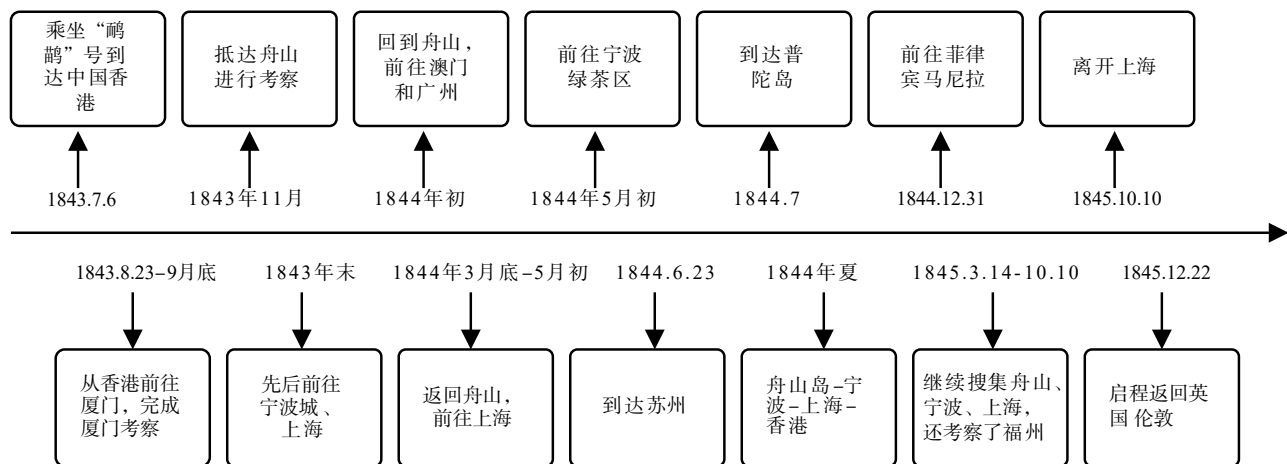


图1 福琼第一次来华路线图

①编者按. 专题: 帝国主义与博物学[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9, 41(11): 1.

类体系已成为帝国博物学的学术支撑，英人来华科学考察的目的之一便是将中国植物、动物及其他生物纳入林奈分类学系统进行命名，从而实现统一、稳定、有效的博物学体系，进而推动以本土为中心的神经系统般的全球博物学网络的形成。

福琼结束第一次考察后，一些新的异域植物进入英人视野，从引种植物名录来看，这些植物最终或以林奈的双名制命名，或由林德利、胡克等知名人士命名，有些干脆以人名为称呼，例如福琼1844年将醉鱼草命名为*Buddleja lindleyana*，很难不令人想象这是福琼引用林德利的名字，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然而，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植物，到达西方后有了新的名称，被略去了符号意义，竟没有了地方性的象征，从而也就淡化了多样性。不仅如此，在实作层面上，《南京条约》助长了帝国主义对中国大陆自然的掠夺，博物学家通过引种和移植物种彰显其帝国权力的渗透，博物学也成为跨国经济贸易的组成部分，为英国带来了巨大的商业价值和利益，这一系列的行为一次又一次地践踏着半殖民地的博物学知识与文化。

## 结 语

“毫无疑问，中华帝国在多年前就已达到巅峰，但自此之后，它的发展与其说是进步，不如说是倒退。许多北方城市，显然曾经繁荣昌盛，如今却衰败不堪，或化为废墟；远山上的宝塔摇摇欲坠，似乎很少修缮；宽敞的寺庙也已不复当年之勇……由此我得出结论，作为一个民族，中国正在倒退，而不是进步……”<sup>[17]</sup>福琼第一次来华见证了鸦片战争后中华帝国断壁残垣的荒凉景象，也以冷静而犀利的笔触将这种景象记录在了他的游记之中，为考察其多次来华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然而，福琼来华，面对中国传统博物学，展现出了矛盾的态度。作为资源掠夺者，他的行为本质上带有明显的帝国主义侵略色彩。初到中国时，他秉持着欧洲中心论，认为“欧洲移民的西式作风应该成为中国人效仿的对象”，

认为中国人普遍具有“骗人，说谎”的习性，掠夺与傲慢是其主要的态度。但在中国深入游历的过程中，福琼逐渐被中国丰富的自然景观和独特的博物学知识所吸引，表示出更多的欣赏和尊重。对于他所到之处的山川地貌，多次用“鬼斧神工”和“仙境”来形容。他详细记录了中国的城乡景观、农具、农作物生长周期等，还对苏州园林里花匠“矮化”植物的诀窍等中国特有的园艺技术进行了记载，表现出对中国博物学知识的认可。他笔下描绘了舟山群岛和慈溪古城等地的如画风光，流露出对中国自然风光的欣赏。

福琼在其来华期间，途经福建生病，当地农民用刮痧茶和汤药为他治疗。“在这个锅里放了六种不同的蔬菜，每种大约半盎司。这些东西包括干橘子皮或香橼皮，石榴，烧焦的栀子果，蔷薇的树皮和木头，以及另外两种我不知道的东西”。这次生病快速痊愈的经历，让他对中医，有了不一样的认识。“我完全愿意承认他们不是外科医生；他们对我们最有价值的许多植物和矿物药物一无所知，这也是事实；但是，作为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相对文明了许多年，已经有了许多发现，并由父亲传给儿子，这些发现是不值得轻视的，也不应该在没有理解的情况下被嘲笑。”他认为，中医的很多知识“毫无疑问，还有许多欧洲人不知道的同样有价值的东西，非常值得研究。”<sup>[18]</sup>随着对中国了解的深入，他的态度开始变得温和谦逊，他开始愈发审慎的记录中国这个古老国度的自然与人文景象。

1842-1862年福琼先后五次来华，与传统的博物学家的身份有所不同，福琼以“植物猎人”的身份进入中国，先后引入、移植上百种中国植物（种子），受到英国社会甚至是美国政府的关注。本文聚焦于其第一次来华，并将研究视角投射至来华背景方面，深入考察这次行动背后的利害关系。表面上看这是一份被冠以伦敦园艺学会派遣的科学考察工作，中国委员会和福琼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前往中国。但事实上，鸦片战争后，英国在华势力的增强导致对中国的研究增加了新的面向，博物学正是其

中的一面。英国列强,通过坚船利炮和威胁利诱迫使清政府签订了涉及政治控制、经济掠夺、文化渗透及其他问题的不平等条约,所以福琼等人来华的存在多半归因于帝国权力的支配,这一历史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英人来华科学考察的目标、方式、路线、成果。

福琼第一次来华证明了鸦片战争及《南京条约》在何种程度上打破并重构了英人来华博物学考察的空间性与地方性。借助现实的政治力量,帝国博物学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地“规训”动植物的生存语境,使生物扩张走向全球化,在英国政府、学术组织和博物学家、植物采集者的共同作用下,原先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联系在了一起。([19], pp.88-92)从异域植物的兴趣和探索来看,福琼深入中国内陆获得前人不曾接触的新的物种、标本以及关于中国园艺、农业、地理等信息;从商业价值和国家利益看,尽管福琼第一次以观赏性或实用性种子和植物为主要考察对象,但他同时留意到中国茶等经济价值极高的物种,为之后前往中国获取茶树植株、制茶设备、制茶工艺,并将其送至印度阿萨姆邦和锡金等地,进而改变世界茶叶贸易版图提供了便利。

#### [参考文献]

- [1] 范发迪. 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 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M]. 袁剑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 [2] 萨拉·罗斯. 茶叶大盗: 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M]. 孟驰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309.
- [3] 戴维·弗格森. 罗伯特·福琼——植物猎人[M]. 李亚蒙、宋丽娟译,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22, 47.
- [4] Devine, T. M. *Farm Servants and Labour in Lowland Scotland, 1770-1914*[M]. Edinburgh: John Donald Publishers Ltd, 1984, 71-96.
- [5] RHS/Col/8/1/2. 'Instructions to Mr Robert Fortune Proceeding to China in the Service of the Horticultural Society of London' and a List of Letters of Introduction'[EB/OL]. <https://collections.rhs.org.uk/view/249938>. 2026-03-14.
- [6] 安布拉·爱德华兹. 植物猎人的世界收藏: 英国皇家植物园珍藏画作背后的发现之旅[M]. 何毅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2, 13-14.
- [7] 李猛. 班克斯的帝国博物学[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9, 44-45.
- [8] 熊姣. 约翰·雷的博物学思想[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 16.
- [9] 温新红. 西方博物学的进程[N]. 中国科学报, 2016-12-23(2).
- [10] 徐保军. 帝国博物学背景下林奈与布丰的体系之争[A], 柯遵科: 博物学史研究前沿[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4, 1.
- [11] 刘华杰. 西方博物学文化[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213.
- [12] 波特. 剑桥科学史第四卷: 18世纪科学[M]. 方在庆译,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0, 129-132.
- [13] RHS/Ken/9/1. 'The Book of the Royal Horticultural Society 1862-1863'[EB/OL]. <https://www.rhs.org.uk/shop/theplantspace>. 2026-03-14.
- [14] RHS/Col/8/1/1. 'Minutes of the Chinese Committee, from Dec 28, 1842 to Feb 23, 1843'[EB/OL]. The RHS Digital Collections, [https://collections.rhs.org.uk/view/249925/minutes-of-the-chinese-committee-from-dec-28-1842-to-feb-23-1843?limit=12&offset=9&utm\\_source=chatgpt.com](https://collections.rhs.org.uk/view/249925/minutes-of-the-chinese-committee-from-dec-28-1842-to-feb-23-1843?limit=12&offset=9&utm_source=chatgpt.com). 2026-03-14.
- [15] 王铁崖.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 31.
- [16] 庆桂等纂. 清高宗实录·卷550[M].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 1986, 1023.
- [17] Fortune, R. *Three Years' Wanderings in the Northern Provinces of China*[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9.
- [18] Fortune, R. *A Residence Among the Chinese*[M]. London: John Murray, 1857, 50.
- [19] 李猛. 帝国博物学的空间性及其自然观基础[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7, 33(2): 88-92.

[责任编辑 王大明 柯遵科]